

院史资料与研究

1996 年第 3 期 (总第 33 期)

- ▲ 孙鸿烈访谈录
- ▲ 回忆贵阳地化所的发展历程 (杨敬仁)
- ▲ 重建东北科学院 (朱尚廉)
东北科学研究所的建立

中 国 科 学 院
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编 者 的 话

说起青藏高原，人们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珠峰、布达拉宫、哈达、牦牛……，但身临其境者却很少很少。从全球的意义讲，青藏高原是海拔最高而又形成最晚的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是与南北两极相比拟的“第三极”。因此，青藏高原就不仅带有一种地理上的神秘感，也更富有科学探索上的挑战性和诱感力，从而成为探险家和科学家大显身手的“最高”舞台。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从五十年代起就不断派出科学工作者前往考察，乃至成为全国自然资源考察任务中投入最多、持续最久和收获最丰者。当人们列举当代中国科学的重大成就时，就会扳指数来：两弹一星、胰岛素与核酸人工合成、青藏高原综合考察……

承蒙孙鸿烈同志慨允和温瑾同志惠助，本期得以《孙鸿烈访谈录》与读者见面，其中涉及考察工作的组织管理、活动细节和人物风貌，我们可以从几代科学家身上看到科学精神、社会责任感和英雄主义气概的闪闪光辉。

应我们的特别要求，鸿烈同志也谈到了他的家世和早年经历。他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石油事业奠基人孙健初老先生的史料。关于鸿烈同志在副院长等岗位上的经历，因其工作繁忙，难以续谈，只好暂付阙如。

院史资料与研究

1996 年第 3 期目录

2000/15

孙鸿烈访谈录	(1)
回忆贵阳地化所的发展历程.....	杨敬仁 (53)
东北科学研究所的建立.....	朱尚廉 (63)
院史文物资料捐赠榜	(68)
编者的话	封三
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封底

刊名题字：武衡

孙 鸿 烈 访 谈 录

采访时间：1996 年 8 月

采 访 人：温 瑾

2K445/15

温 瑾：院史研究室的樊洪业同志委托我来采访您，因为您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又是中国早期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的独子。您的工作经历和您的家世，对研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近代科技史都是很宝贵的资料。就请从您小时候、从您的家说起吧。

孙鸿烈：樊洪业同志送我看过《院史资料与研究》上刊登的“严济慈访谈录”，他希望我也能接受采访，也有个访谈录。我想，我不能与严老相比，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什么好写的，但为了配合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工作，我就谈谈吧。

我祖籍是河南。河南濮阳，现在的中原油田就在那里。我出生在北京。我是 1931 年农历腊月廿四日出生的，到 1957 年人口普查或是选民普查时将我的生日换算成 1932 年 1 月 31 日，以后就用这个生日。不知是哪一年办护照时填成了 1 月 2 日，所以现在我在外

事活动时都用1月2日。

我父亲是学石油地质的，名健初，号子乾。他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到我祖父那一代，家境已经不好了。我父亲出生后不久，生母就去世了。我祖父又续弦，生了老二、老三。因为他很受继母的气，就由我曾祖母照顾他。他很不愿意在家呆着，就跑到国立六中上学，好像在山东西部荷泽县，濮阳离他上学的地方很近，是邻县。是一个教育家办的学校，还是公费。中学毕业后又去上山西大学，也是因为山西大学管吃管住，不要学费。他读矿冶系，大学毕业后，就到了翁文灏的单位工作，当时叫地质调查所，是属经济部管辖的，设在北京。我父亲是翁文灏先生招聘去的。他在这个调查所一直干到1940年，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到湖北的大冶铁矿，到西北调查石油，又发现了玉门油矿，以后就调到了玉门油矿。

温：这就是说，玉门油矿是孙健初先生发现的？

孙：是的。1937年，翁派他到西北去调查石油。当时为什么他追踪到玉门这个地区呢？因为当时玉门有一条河叫“石油河”，这条河里就飘着油花，说明石油已渗出地表而流到河里去了。当地农民就到石油河里去撒石油，膏车轴。轮子当时是没有滚珠的。我父亲他们就在那儿做详细的地质调查研究。1937年翁文灏还从美国请了一个美国专家，叫Weller，与我父亲合作调查，很快确定了储油层。当时我父亲写了一些文章，都是关于玉门油矿的。国民政府就决定在玉门开采石油了。那已是抗日战争时期了，石油是一个重要的战

略物资，当时都是从美国买油，有时也从苏联进油。那时要打钻，听说在延安附近有一个叫延长的地方在打井，有一个钻机。其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有驻重庆办事处，由周恩来同志负责。他们通过周总理要借这个钻机去，共产党这一方慨然应允，就把这个钻机借去了。当时延长矿有一个矿长叫严爽，他就跟着钻机到了玉门油矿。这一段经历还可查阅《孙健初生平大事年表》。钻孔的位置是由我父亲确定的，打井以后果然喷油了。后来在玉门油矿基础上渐渐发展扩大成中国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就是孙越崎。又成立了甘青石油分公司，我父亲就是甘青石油分公司地质探勘处的处长。解放后各大油田的地质老总们，很多是我父亲在地质探勘处培养出来的。我当时在念中学，这个石油探勘处正在扩大，很多大学毕业生被吸收进来，他们现也是70多岁的人了。当时培养出来一代石油地质的人才，解放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46年，这个处从玉门迁到了兰州，1951年，又迁到北京。我父亲又成为燃料部石油总局地质勘探的总负责人，总地质师。但1952年就去世了。那时我母亲生病住院，我住校。他一人在家，石油总局为他雇了一个老保姆作饭。那时我们家住平房，三间，一间是堂屋，一间卧室，一间就是厨房，老保姆住厨房，晚上老保姆把炉子移到堂屋。夜里煤气吹进了父亲的卧室，我父亲中了煤气，那是1952年11月。我父亲才54岁。

现在讲讲我母亲。她叫张芳晨，出身很苦，小时因为家里穷，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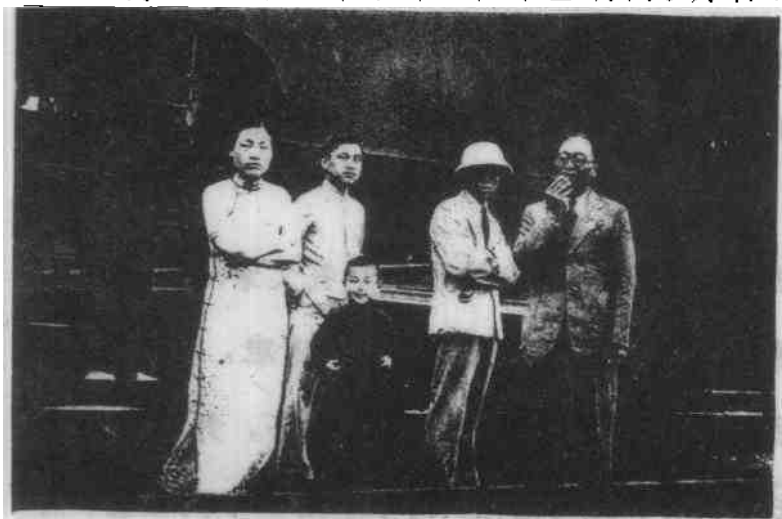
把她卖给一个军阀家里当丫环。军阀叫王虎臣。那是 20 年代，军阀混战。我母亲是山东馆陶人，就是武训的家乡，很穷。王虎臣相当于一个师长。王有几个老婆，我母亲伺候的是最小的一个，叫毕兰卿。我母亲常说，她爱忘事就是因为小时候老挨打。毕兰卿抽大烟，一不高兴就用烟锅往脑袋上敲，但一直到毕兰卿去世，我都一直以为毕是母亲的姑母，叫她“姥姥”，我母亲让这样叫的。我知道她不是亲姥姥，因为她们俩人的姓不一样。但我母亲一直没有告诉我真相。毕还有个侄女，叫王哲钧，我们叫她小姨。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母亲才告诉我们真相。但我母亲还是很感谢毕兰卿，因为我父亲就是她介绍给我母亲的。我母亲觉得找了这样一个体面的丈夫，还是很幸福的。所以我母亲就把毕看成亲娘一样的了。我似乎记得我母亲后来还同她一个家乡的亲哥哥有过联系，但印象很模糊了。

毕兰卿 1958 年就去世了。她在北京有两所大宅院。我们家在“七七”事变前就离开了北京，地质调查所搬到了南京，后又到四川，我们就跟着地质调查所搬。1940 年后父亲又把我母子接到甘肃，直到 50 年，所以从 37 年到 50 年我们就与北平失去了联系。50 年，我中学毕业后母亲才与北京毕家联系上。毕的一所房子就在宣武门附近头发胡同，后来动员毕兰卿卖这所房子，要给纺织工业部的一个部长盖住宅，以后她卖了房，搬到石驸马大街另一所房子，我们也一起搬到石驸马大街，我后来结婚就在那里。老太太去世后，我母亲也不愿接受她的遗产，都给王哲钧了。我母亲搬出来，到了石

油部的宿舍，在六铺炕。我父亲去世后，石油部很照顾。我当时正上大学二年级，我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我父亲的老朋友黄汲清等，说孙家孤儿寡母的，希望除了抚恤金之外，石油总局还应给些照顾，给我母亲安排一个工作。石油总局就让我母亲去了档案科，管理档案。我母亲不大会写，但她能看厚本小说。她自己一直学认字，坚持看报。1976年我母亲去世，肺癌，她抽烟很厉害。她从小受苦，与我父亲生活才算好转，解放后刚过几天好日子，我父亲54岁就去世了，我母亲那时才40多岁，后来心情一直不好。

另外，我父亲早年在农村时就结婚了。他是在上中学时依父母之命结婚的，有两个女儿。他后来到荷泽、太原上学，到北平工作后，因要与我母亲结婚，就与农村的妻子离婚了。后来大姐去世了，二姐在文革期间还带着她丈夫到北京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我1932年生于北平，住丰盛胡同。为什么叫孙鸿烈？“姥姥”让



孙健初 1937 年在南京下关火车站

右 1 孙健初，左 1 张芳晨，中间儿童为孙鸿烈

人算卦，说我缺水，缺火，就叫鸿烈吧，有水，有火。小名叫平生，因为是在北平生的。小时我父亲的朋友，都叫我平生。“七七”事变前，华北形势已经紧张了，当时

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所以我们全家人也就搬往南京了。我那时5岁。不久我父亲被派往西北去调查石油。我还保存一张照片，是送我父亲在下关火车站时拍的，我穿一件长袍，那张照片很珍贵。照片上还有四叔，四叔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因家里穷，我父亲让他同曾世英学画图。曾世英现在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编中国第一部地图集的人。照片上还有王曰伦，解放后曾任地矿部天津地质所的所长。37年父亲走后就一直在西北。上海沦陷前夕我们又搬到安庆，后又迁到长沙，又呆不住了，只好迁到四川的北碚。到北碚可能是38年，我上了小学。40年我父亲来接我们去了西北。因为玉门条件太差，我和母亲就住在酒泉。那是玉门油田的一个后勤基地，家属宿舍也在这里。

37年在南京的经历我记不清了，只知道是住在桃园新村，与尹赞勋住在一块儿，尹是我国古生物学界的前辈。他女儿尹文英后来曾是上海昆虫所的所长，现在也是院士。小时我母亲他们大人逗着玩，问我长大找媳妇找什么样儿的时，我就追着尹文英说：“就找尹姐姐这样的。”

当时我们从南京逃难到北碚，整个过程都是我父亲地质调查所的朋友们帮助，非常艰苦。大部分是坐轮船，都在逃难，秩序混乱。那些叔叔伯伯们抱着我，我母亲拿着行李，连推带挤，好不容易上了轮船。在安庆我们住在农村。我还记得，我母亲用一个大澡盆，椭圆形的，把我放里面，用竹竿撑着，到湖里去采菱角。后来又到长

沙。

迁到北碚就有印象了。嘉陵江发大水，在镇上呆不下去了，上到丘陵上。我父亲不在，我母亲没有精神寄托，就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每礼拜都带我去教堂。当时发大水，我们就逃到教堂里去了。住了起码半个月，水退了，回到家里后，光淤泥就几十公分厚。还有躲警报，日本飞机炸重庆很厉害，防空洞有震塌的，也不敢去了。就在桌子上摆被子，躲在桌子底下。为躲日军空袭，后来搬到乡村。还发生过小偷来我们家偷东西。我们家后窗外是竹林，半夜小偷用又粗又长的竹竿子从窗外伸进来挑衣服。我母亲发现了，一边用竹竿往外捅，一边大叫捉贼，把贼吓跑了。

在北碚乡村——渔塘湾时，我们与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人住邻居。陈恩凤（后来是沈阳农学院的院长）、马溶之（后来是南京土壤所所长）、熊毅（后来是南京土壤所副所长、所长）等都住在那儿。住的房子是用竹竿搭起来的。墙是竹编篱笆再糊上泥，现在的工棚都比那房子强。可那时这些研究员身份的人就住在那种破房子里。他们叫“难民村”，条件十分艰苦。

有一个叫周宗浚的，也是父亲的同行，他有一个儿子，比我们都大，鬼点子多，大家叫他“小闹”，曾在春节时逗一个男孩，使他掉进粪坑。小时淘气事也很多。

马溶之刚刚结婚，新娘很喜欢我，我母亲就对我说：“那你就叫她干娘吧！”我吓唬一下就跪下磕了一个头。后来我见到他们，只要

没有人时就叫他干爸、干娘。后来马先生调综考会当副主任，当时竺老当主任，把马先生调来，作了我的顶头上司。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斗，不久去世了，很可惜。这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中国土壤学界应该是坐头一把交椅了。

温：从小在那样一种环境下生长，是否对您后来学土壤地理，并立志成为科学家有影响？

孙：起码是一种因缘吧。你想想，在那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这些大知识分子们仍然坚持搞科学研究，整天都是土壤肥料。我父亲自 37 年到 40 年，只身在大西北。抗战逃难，那样艰苦，他舍家为国，都是为了一个事业。所以我觉得搞科研的人都挺崇高的。从小就有这种深刻的印象。

40 年我父亲来北碚接我们去西北，当时我母亲怀孕了，朋友们都劝他等生了孩子以后再走，我父亲是个很认真的人，说矿上有很多事，坚持马上要走。是坐玉门油田的卡车走，那种卡车叫“羊毛车”。当时新疆是盛世才的天下，他与苏联拉关系，用羊毛换苏联卡车，所以叫羊毛车。我父亲坐前面一个车，我母亲带我坐后面一个车。上路时我还发疟疾，一会冷，一会热。路上又发生了车祸，加上颠簸，到了剑阁，我母亲就流产了，大出血。住在小旅馆里，十分肮脏。被头像抹了一层黑油，虱子到处都是。随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叫陈贲的年轻地质学家，这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我父亲很喜欢他，可惜后来被打成右派，去世了。我们就在那个旅馆住了几

天，也没有医生，就请了一个农村的接生婆。后来我母亲不能生育，我父亲去世时她住院，也是因为妇科病。她常后悔地对我说：如果我不住院，你父亲也不会去世。

后来我在酒泉的河西中学附小上学。河西中学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学校，在西北小有名气。它的许多教师都是从内地逃难去的。我就在这个小学，从三年级上到六年级。小学毕业后又上了初一、初二。这个学校是很严格的，每天晚上上晚自习。没有电灯，每人拿一盏马灯。

我记得常沙娜，她现在是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当时跟着她父亲常书鸿到了酒泉。那时她父亲带着他的法国妻子和常沙娜，从法国回来研究敦煌艺术。常沙娜插班到河西小学。她很“洋气”地穿一条裙子。这非同寻常，那地方哪见过穿裙子的人？都问裙子是怎么回事？里面有裤子吗？比我大的孩子就怂恿我去掀她的裙子看。有一次她在操场上，我就猛然跑到她跟前，一下就把她的裙子掀开了，把她闹了一个大红脸。

后来常书鸿的妻子受不了那种艰苦，就带着常沙娜离开了。所以我们同学时间很短。再一次见面是在1960年，我们黑龙江考察队在北京饭店开会，在餐厅里吃饭，常沙娜与一位女士过来问我是否是孙鸿烈，这样我们就又见面了。因为在酒泉文化层次高的人不多，我父亲与常书鸿有点接触。在徐迟的《祁连山下》一书中，还有一段描写，就是我父亲曾救过常书鸿。《祁连山下》描写两个人，一个

是我父亲，在西北开采石油，一个就是常书鸿在敦煌研究艺术。后来他妻子走了，他去追，晕倒在戈壁滩上，我父亲救了他。

在小学里，学生淘气的事儿也很多。我们教室挂黑板那面墙的隔壁，是另一间教室，也许同学们不喜欢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就把墙挖了一个洞。那个老师上课时，另一班的学生就用竿子从洞里捅黑板。

我初一时还演戏，演的当然是配角，晚上住学校排演。

温：学习怎么样？

孙：学习不是很好。记得小学、初一、初二学习都不好，到了兰州时，住校学习才好起来，但也不是每门都好。比如物理，怎么也学不好，同学怎样辅导都不懂，但数学好。我想我现在思维逻辑比较清楚就得益于数学。那时数学也要求严格，比如代数，等式要用尺子画，所有等式都要一条线下去，本上一个改错都没有。老师经常拿着我的本子在全班展示：“你们看孙鸿烈的本子多整齐！”也奇怪，凡是与数学有关的我都有兴趣，不论代数、几何、解析几何都感兴趣。那时我的数学是拔尖的。也是班主席，可是在酒泉时不行。我记得酒泉河西中学有许多孩子也不是酒泉人，但住校，可我不住，人们总觉得我有点特殊。比如我父亲一个老朋友来看我们，送我一支自来水笔，就是“派克”笔，一时成了稀罕物，以前谁也没见过。大家用的都是蘸水笔。到兰州才见过圆珠笔，那时叫“原子笔”。后来忘了为什么事，同学起哄，把我抬起来了，抬完后笔就丢

了。不知让谁拿去了。现在想起来，可能他们都把我当成少爷看。当地的人很穷，像我这样境况的人很少。我是比较优越的。

还有一个原因影响我的学习，就是读小说。小学时我读完了《三国》、《水浒》、《三侠五义》、《西游记》。有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摊开一本小说偷看，反正功课也能考及格。《红楼梦》我不爱看，现在我也不爱看，它描写感情太细腻，爱看的情节又不多，总是拿起翻两页就不耐烦看不下去了。

温：当时你父母的情况怎样？

孙：我父亲在玉门，距离酒泉不算太远，可路不好，要走很长时间，所以他也不常回来。每年暑假我就到矿上去。那时矿上给他和另外一个钻井工程师董子敬盖了一套非常高级的房子。董子敬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因为那时在台湾又要成立一个石油的分公司。房子是别墅式的，专门有厨师给他们



1981年在玉门油矿重建“孙健初同志纪念碑”

中间为孙鸿烈

俩作饭。暑假我就住那里，碰上地质勘探，就同他们一起跑野外，骑骆驼，骑马，很有意思。小时就觉得大自然大有意思了，大令人心旷神怡了，我喜欢往外跑。

不过，玉门油矿的工人真苦。工人在阶地的坎上挖一个窑洞，烧原油，熏得鼻眼都是黑的。当时奋斗目标是一年要产原油 180 万加仑。有一年完成目标了，大概是 43 或 45 年，我们去参加庆祝游行，晚上点着火把。工人把头剃光，头上顶一盏矿灯，踩高翘，古装戏，跑旱船，大家都很高兴。

温：你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呢？

孙：他很古板。我们实际上没有在一起住多长时间，37 年到 40 年他在西北，以后他一直在玉门油矿。到兰州才住在一起。我又住校了，周末才回家。

我父亲从来不上街，也从来不看电影。到周末我们动员他去进城上街。我们那时住南门外，离城很远。当时有一辆美国的中型吉普，像通勤车，周末拉着家属进城，但他从来都不去，下班就回家、看书、抽烟斗，没有任何业余活动。

温：你们父子之间有交流吧？

孙：很少。但通过和大人们去野外，感到学地质很好玩。另外，他在兰州时，一些年青地质学家像刘东生曾到过兰州，还到家里来吃饭，因为我父亲在西北地区的地质界算是权威了，所以谁来了，都要去家里转一转，看一看，熟悉一点的，就请到家里来吃饭。我就

是这样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接受薰陶长大的。

我父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一心为石油事业。我母亲则是一个很厚道的人，很善良，谁有困难都去帮助。这些方面可能对我会有些影响。

我想讲我母亲的几件事。我们在酒泉时同住一个院里，有一个负责油矿电话通讯的总工程师去世了。他夫人带四个孩子，夫人又没有工作，他们全家就由我母亲管了。我们搬家，他们随我们一起搬，经济上也由我母亲接济。前几年，他大儿子叫周勇，还写信来，说孙伯母给我们全家的恩德是无法报答的，有了她才有我们的今天。

我母亲很富有同情心，关心别人，所以与她同住的人都与她关系很好。

小学、初中时就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了，与学校同学感情都不是很深。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是兰州这一段时间。

兰州当时最好的学校是西北师院附中，在西北也是很有名的。它的教师的班底，是北师大附中的，抗战期间北师大附中的老师到了西北，所以师资水平是很高的。学校在十里店，离兰州十里，在黄河北岸。父母都认为要上好学校，所以就考插班进了这所中学。

我认识我的妻子吴焕宁就在考插班的时候。她父亲是西北公路局负责会计事务的。考插班时有十来个人，但考上的只有我们俩，而且又只有她一个女孩，又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对她就比较注意，就觉得像是有点特殊联系似的。

初三到高三，这个学校对我影响就大了。一是因为住校。我们全班男生住在一间大宿舍里，一进门两排上下铺，一人几尺宽，关灯前大家就什么都聊，关灯后老师查铺。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用的水是从黄河拉来的，要靠毛驴把水驮过来，走到黄河边要走半小时。在校门口支一口大锅，烧热水。早晨每人端脸盆去校门口，一人一勺热水。也没有饭厅，校园里八人一桌，每顿饭是一盆菜，一盆馍，值班生打饭，大家围着大圆盆蹲在那儿吃饭。一刮风端起碗就往教室跑，早饭只有一种菜，煮黄豆，非常好吃。同学们逗乐，规定一筷子只能夹一粒黄豆，看谁吃得快，夹得准。

这个学校非常讲究教学质量，升学率非常高。也没有什么政治活动。后来文革中调查学校里的三青团、国民党，当时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学校有一种很民主的空气，每礼拜一叫“总理纪念周”。我们是站在操场里，听一个老师讲，但也不是讲“三民主义”。我记得有一次讲怎样刷牙，有一次一个英文老师讲怎样翻译，讲“实译不死译，活译不胡译”。所以，学校对我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影响很深。记得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新观察》杂志，是储安平主办的，经常抨击国民党，在我们学校非常流行。

解放前一年来了一个校长叫张建侯，他儿子与我同班。同学中传他是国民党员，是来控制学校的，还有人透露他有贪污现象，贪污学校经费。现在回想，这可能是地下党在活动，后来发动一次学潮，出壁报，抨击张建侯。我记得，有一天夜里，班里有同学让我